

非洲殖民地的政府干预与经济作物生产的兴起

李鹏涛 王 萌

【内容提要】 殖民地政府极力推动非洲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不过, 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能否成功, 不只是殖民地干预的结果, 更与这一经济作物生产是否迎合非洲当地社会的利益诉求密切相关。在非洲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西非殖民地, 经济作物生产的兴起主要是非洲农民主动性的结果, 例如加纳的可可经济。在东非和南部非洲殖民地, 尽管经济作物生产的出现离不开殖民政府干预, 但是这一经济作物生产能否取得成功同样也与当地非洲农民能动性密切相关。

【关键词】 殖民统治; 政府干预; 经济作物生产; 单一经济; “依附论”

【作者简介】 李鹏涛, 副研究员,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金华, 321004); 王萌,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生 (金华, 321004)。

殖民统治时期, 非洲经济作物生产取得重要发展, 这构成了殖民时代非洲经济变革的重要内容。殖民者提出“剩余出路理论”(vent for surplus theory), 用以解释一些非洲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的起源, 这一观点强调殖民当局通过修建公路、建立市场以及引入货币等方式, 为闲置的非洲劳动力提供了有利可图的出路。按照这一观点, 经济作物出口的增长只是因为之前闲置的非洲劳动力被投入到之前未被利用的土地之上。^①

① 参见 A. G. Hopkins,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1973。

这一流行叙述抹杀了非洲社会的能动性,而突出强调殖民地政府在非洲经济变革中的主导作用。^①然而,随着非洲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日益深入,这一观点受到极大挑战。相关研究强调,殖民地政府试图推动和控制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但是非洲农民并非殖民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殖民地政府干预成功与否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能动性。殖民地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这些政策能否适应非洲社会的利益诉求。某些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的兴起,甚至是非洲农民在殖民地政府极力阻挠的情况下推动形成的,这方面的著名案例包括20世纪初加纳可可种植业的兴起。^②本文主要以英属非洲殖民地为中心展开论述,首先讨论殖民地政府推动经济作物生产的主要动机,然后分析殖民地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及其局限性,最后重点探讨非洲社会在经济作物生产方面的历史能动性,以期深入分析非洲殖民地政府干预在经济作物生产兴起过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深刻认识非洲单一经济的历史起源。^③

一 殖民地政府推动经济作物生产的基本动机

殖民地国家积极推动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变革,主要是为了促进资本

① Gerald K. Helleiner, *Peasant Agriculture,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Nigeria*, Homewood: Richard D. Irwin, 1966; R. Szeszowski,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Economy of Ghana, 1891-1911*,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5.

② 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参见 Polly Hill, *The Migrant Cocoa-farmers of Southern Ghana: A Study in Rural Capitalism*, Oxford: James Currey, 1997, pp. 15-17; Gareth Austin, *Labour, Land and Capital in Ghana: From Slavery to Free Labour in Asante, 1807-1956*,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5; Corey Ross "The Plantation Paradigm: Colonial Agronomy, African Farmers and the Global Cocoa Boom, 1870s-1940s,"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9, No. 1 (2014), p. 59.

③ 经济史一直是我国非洲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涌现出大量的重要研究成果,如《非洲通史》(何芳川、宁骚等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和《殖民主义史(非洲卷)》(郑家馨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非洲经济史研究的引介,主要参见舒运国、刘伟才《20世纪非洲经济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舒运国《国外非洲史研究动态述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张忠祥《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张瑾:《非洲经济史研究的历程和视角》,《学术探索》2015年第6期;舒运国《非洲人口史研究评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李鹏涛《非洲经济史研究的新动向》,《史林》2019年第1期。

主义形式的生产和交换，从而满足帝国本土所要求的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殖民主义导致非洲的农业生产与贸易模式急剧重构。19 世纪末殖民统治确立后，殖民统治需要推行强制性的经济秩序，产生出足够多的税收以支撑殖民地政府，而重要手段是鼓励面向出口的经济作物生产。殖民地政府最初依靠的是前殖民时代的出口商品，例如，尼日尔三角洲的棕榈油、桑给巴尔的丁香。不过，这些作物产量较少，并且很多地区在殖民征服之前没有种植经济作物的经历。气候炎热、距离遥远以及地形特点都阻碍了非洲农民的剩余产品生产。殖民地政府急需税收基础，因此积极推动适应特定殖民地环境状况的经济作物生产。只要能够增加殖民地国库收入，殖民地政府愿意尝试种植任何经济作物，并且鼓励任何生产方式。殖民地政府依赖于非洲当地税收，而非帝国本土财政，从而使得它们以这种直接方式与非洲人的生产和交换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导致殖民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独立”于帝国本土。^① 无论是殖民部还是殖民地政府，它们都并非单纯的帝国本土商业利益的工具。殖民地政府通常有着自身利益，有时甚至是与帝国本土政府的意图截然不同。殖民地政府希望非洲臣属生产那些回报最高的产品，因为这能实现应税收入最大化，也最有利于殖民统治。例如，尽管英国政府希望尼日利亚北部的农民种植棉花，但是当大多数农民决定种植花生时，尼日利亚殖民当局并未阻拦。而且，在帝国本土压力已经消失的情况下，一些殖民地政府仍然热衷于从事经济作物生产。

按照殖民者的流行观念，生活在农村地区的非洲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无法对眼前的需求和机会做出判断和回应。殖民地政府将这些农村地区视作未开发的劳动力储备地和农业生产地，必须由外来刺激才能实现发展。“传统的”维持生计生产和农民生产的显著区别，反映出殖民者关于“落后”非洲经济活动的认知。这一认知是非历史的，因为忽视了前殖民时代东非沿海、埃塞俄比亚以及索科托哈里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大规模的土地所有制、土地租赁、市场导向生产等基本特征。在尼日利亚北部，既有的农业体系为殖民时代花生生产奠定了基础。在东非沿海地区，尤其是斯瓦西里沿海地带，前殖民时代出口导向的种植

① John Lonsdale, and Bruce Berman “Coping with the Contradic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onial State in Kenya, 1895 – 1914,”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20, No. 4 (1979), p. 490.

园和分成制农业体系转变为殖民时代的出口种植体系。^① 英国殖民者试图将维持生计的非洲农民转变为出口导向的农民,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殖民地政府会采取劝说甚至强制措施。将非洲“维持生计”的农业生产者转变为农民,并且推动他们种植某些经济作物,这既增加了政府税收,同时也将非洲人变成“经济人”,也就是商品消费者和生产者。南罗得西亚土著事务部的一位官员总结道“如何才能刺激非洲土著工作?答案是为(土著)创造尽可能多的需求,诱导他采用现代耕作技术,并且使他远离酒瓶。”^②

非洲殖民地政府试图确定经济作物种类、价格以及市场控制机制。在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的西非沿海社会,殖民经济政策试图推动这些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市场。在有着经济作物生产传统的地区,殖民地政府推广经济作物生产的尝试,可能威胁到现存的生态、经济与社会平衡,同时导致非洲社会以牺牲粮食作物为代价来增加出口作物生产。因此,殖民地政府扩大经济作物生产的尝试不一定取得成功,很多非洲生产者仍然维持较少剩余产品的生产模式,这些非洲人成为殖民者干预的主要目标,目的是将维持生计的非洲生产者纳入殖民地出口经济之中。^③

二 殖民地国家干预非洲经济作物生产的主要手段

殖民地政府采取多种手段来推动非洲经济作物生产。在殖民统治时代早期,交通运输业发展成为推动非洲农村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非洲乡村地区开始汽车运输,经济作物生产扩展至全球贸易以往难以达到的地区,并且为农村地区创造商业机会,推动了农作物生产发展。不过,单独这一点并不足以推动非洲生产者进入殖民出口

① Paul Tiyambe Zeleza, *A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Africa*, Vol. 1,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akar: Codesria Book Series, 1993, pp. 8-9.

② Timothy Burke, *Lifebuoy Men, Lux Women: Commodification, Consumption and Cleanliness in Modern Zimbabw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6.

③ Moses E. Ochonu “Africans and the Colonial Economy,” in Martin S. Shanguhuya, and Toyin Falola,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frica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125.

经济生产体系之中。为了吸引非洲生产者放弃维持生计生产，并且推动市场导向的非洲生产者增加产量，殖民经济决策者通常采取多种手段。

第一，动用强制手段推动经济作物生产。在坦噶尼喀，甚至在东非战役还未结束时，仓促成立的“占领区政府”已经迫不及待地鼓励维多利亚湖地区的棉花生产。“一战”后，在饥荒造成严重伤亡的情况下，英国仍然鼓励饥荒地区的棉花出口。^① 坦噶尼喀出口作物剑麻、咖啡和棉花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殖民地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殖民政府鼓励南部沿海地区的棉花种植，而阻挠面向市场的水稻生产，因而导致水稻大量依靠进口。英国殖民政府还鼓励中部地区的花生和谷物种植，而阻碍原有的畜牧业发展。^② 在西非地区，非洲农民早在 19 世纪已经开始商品生产，他们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济作物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粮食作物生产的补充。欧洲人争夺贸易商路控制权，将棕榈油和花生运送到沿海地区。在没有白人移民或者矿业开采行业的地区，殖民地政府鼓励非洲农民生产。

殖民地政府借助非洲社会权力结构来实现推动经济作物生产的目的。酋长和殖民者在推动经济作物种植方面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酋长们迫使臣属生产政府所要求的经济作物类型，以维持自身在殖民地社会中的特权地位。倘若达不到配额目标，则会被剥夺酋长身份。葡萄牙殖民者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采取强制性的殖民地农业经济生产，建立国家主导的殖民地经济，依靠强制的大规模面向出口的棉花和甘蔗种植。^③ 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一战”前试图建立种植园，并且鼓励本国公民在西非殖民地建立种植园和白人移民农业。这些早期的种植园试验失败，推动了

① Gregory Maddox, “Mtunya: Famine in Central Tanzania, 1917 – 1920,”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31, No. 2 (1990), pp. 181 – 198.

② Dennis M. P. McCarthy, *Colonial Bureaucracy and Creating Underdevelopment: Tanganyika, 1919 – 1940*,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5 – 52; Thomas Spear, *Mountain Farmers: Moral Economies of Land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rusha and Meru*,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158 – 172; Deborah Fahey Bryceson, *Food Insecurity and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anzania, 1919 – 198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p. 71 – 75.

③ Allen Isaacman, *Cotton Is the Mother of Poverty: Peasants, Work, and Rural Struggle in Mozambique, 1938 – 1961*, Portsmouth: Heinemann, 1995; Gervase William Clarence-Smith, *Slaves, Peasants and Capitalists in Southern Angola, 1840 – 192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殖民地政府重新将非洲生产者转变为出口导向的农民, 并且增加那些从事出口农业生产的非洲人的生产能力。^① 英国在苏丹也积极推动棉花生产, 主要通过“杰济腊 (Gezira) 灌溉计划”。棉花非常适合大多数自给自足的非洲小农生产, 由农民家庭成员提供廉价劳动力, 主要是棉球成熟时的采摘工作。而且, 在耕种和加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原棉可以运送到全国各地的轧棉作坊。苏丹棉花主要在新近灌溉土地上种植; 这里的棉花是由私人公司苏丹种植辛迪加 (Sudan Plantations Syndicate) 的小农租户种植, 而公司提供加工、销售和技术服务, 实际收益由种植者、公司和政府共同分享, 政府则主要负责大型灌溉工程。然而, 如同很多其他地区的殖民地一样, 依赖于单一作物使得苏丹容易受到全球市场变化的影响, 这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表现得极为明显。^②

第二, 禁止非洲人种植某些经济作物。在白人移民殖民地, 殖民地政府扩大经济作物生产的努力主要针对白人农场主。按照殖民地政府政策, 这些白人农场主构成殖民地经济作物种植的基础, 殖民当局试图确保农场的非洲劳动力供应, 并且阻止那些仍然拥有小片土地的非洲人与白人农场主发生竞争。肯尼亚殖民政府颁布法律阻止非洲土地所有者种植咖啡、茶叶和其他作物, 规定这些只能由白人移民种植。^③ 殖民当局在南部和东部非洲的移民殖民地采取类似政策。这一状况与西非的小农经济殖民地形成鲜明对比。非移民殖民地并不存在白人移民农场主, 殖民当局鼓励非洲农民重组生产手段, 主要生产可可、花生、棕榈油、棉花和芝麻等经济作物。

生产咖啡这一最赚钱的农作物需要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完美结合, 乌干达的厄尔贡山、肯尼亚的阿伯德尔山脉和坦噶尼喀的乞力马扎罗山区和梅鲁地区较为适宜, 因此这些地区的经济逐渐变得繁荣, 而在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咖啡价值因为质量控制不充分而下降。就咖啡而言, 规模和

① Marion Johnson, "Cotton Imperialism in West Africa," *African Affairs*, Vol. 73, No. 291 (1974), pp. 178 - 187; Richard Roberts, *Two Worlds of Cotton: Colonialism and the Economy in French Sudan, 1800 - 194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Richard Roberts and Allen Isaacman, eds., *Cotton, Colonialism and Social History in Sub-Saharan Africa*, Portsmouth: Heinemann, 1995.

② Richard Reid, *A History of Modern Africa*,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2, p. 199.

③ Tabitha Kanogo, *Squatters and the Roots of Mau Mau, 1905 - 1963*,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7.

组织问题更为含糊不清。当地的罗布斯塔（robusta）咖啡已经在非洲多个地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这通常依靠非洲小农就可以生产。然而，更值钱的高山咖啡所需要的加工流程使得较大的生产单位拥有更大优势。不过，这一优势也并非决定性的，厄尔贡山和乞力马扎罗山麓的非洲咖啡种植者的成功表明，咖啡可以实现非洲当地人生产。肯尼亚和安哥拉的欧洲种植园主实际控制垄断，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权力，而不是更高的经济效率。在肯尼亚，基库尤人和坎巴人在咖啡种植园劳作，他们迅速熟悉咖啡耕作技术，他们也希望自己种植咖啡，但是殖民地政府对于非洲人种植咖啡做出极严厉的限制，以免影响到白人经济作物种植。20 世纪 50 年代，在咖啡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情况下，肯尼亚殖民地政府为保住自己的税收，同时也是为了在“茅茅运动”背景下安抚非洲人，开始允许非洲小农种植咖啡。^① 事实证明，在殖民地政府放开对于非洲人咖啡生产的限制之后，非洲人的咖啡生产极富成效，严重冲击了欧洲人在咖啡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② 同样是咖啡生产，相邻殖民地坦噶尼喀和乌干达主要为非洲小农生产所主导。“一战”后，坦噶尼喀的咖啡种植发展迅速。乞力马扎罗山和梅鲁山麓的白人移民利用这一地区与蒙巴萨港之间的肯尼亚铁路，开始大量种植咖啡。与此同时，当地非洲人也开始种植咖啡，并将山麓的公共牧场变成咖啡农场。1923 年，在英国殖民官员和农业技术专家鼓励下，非洲人一共种植了 30 万株幼苗。坦噶尼喀的白人移民也试图像肯尼亚白人那样阻挠非洲人种植咖啡，却并未成功，这主要是因为非洲人咖啡种植极为成功并且得到英国殖民官员支持。到 1933 年，非洲人一共拥有大约 600 万株咖啡，乞力马扎罗山区 1/3 的非洲人家庭种植咖啡，坦噶尼喀一半以上的咖啡是由非洲人种植。^③ 在布科巴地区，为充分利用该地咖啡种植的发展潜力，地区官员在 1919 年至 1922 年推行咖啡强制种植计划。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咖啡价格高涨刺激非

① David Hyde, “‘Paying for the Emergency by Displacing the Settlers’: Global Coffee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in Late Colonial Kenya,”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4, No. 1 (2009), pp. 81 – 103.

② Nicholas E. Makana, “Metropolitan Concern, Colonial State Policy and the Embargo on Cultivation of Coffee by Africans in Colonial Kenya: The Example of Bungoma District, 1930 – 1960,” *History in Africa*, Vol. 36 (2009), pp. 315 – 329.

③ Andrew Coulson, *Tanzania, A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76.

洲农民大规模种植咖啡。^① 在乌干达, 殖民地政府同样并未阻挠非洲小农的咖啡生产, 因为乌干达 “没有白人移民的存在, 不像肯尼亚白人那样急需土著劳动力”。^②

第三, 市场控制手段。殖民地政府时常授予特定商人群体以商品销售权。这些商人大多是移民群体, 在东非是印度次大陆居民, 在西非则是中东或者地中海居民。这些控制措施并未有效阻止非洲人从事贸易活动, 却压制了付给农民的价格。作为回应, 非洲农民支持建立合作社, 以实现对于他们所销售农作物的更大程度的控制。在英属和法属非洲殖民地, 殖民地政府广泛设立销售局, 设定农作物销售的最高和最低价格, 当价格过低则提供补贴。在尼日利亚北部殖民地, 欧洲产品购买者和利凡特公司、亚洲和非洲商人推出提前付款和收成抵押, 使得非洲农民欠下农产品收购者大量债务, 也使得农民必须持续参与经济作物生产。农产品收购者向农民预先付钱, 让他们在旱季支付税收。农民抵押他们的收成, 然后被迫在旱季再次抵押产品。这样一种设计使得非洲农民陷入持续贫困。^③

第四, 征收人头税。很多地区的非洲人最初可以以实物形式缴税, 然而殖民地政府很快要求以现金形式缴税, 而这只能是通过经济作物生产或者外出务工来获得。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这些新需求往往导致生存危机, 特别是在降雨量和环境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农村非洲人家庭需要年轻人增加农作物生产, 或者销售更多牲畜。总体而言, 这些经济活动的回报较低, 其中大部分被收税人收走。面对殖民地国家的要求, 非洲家庭发生剧烈变革。很多地区的经济作物生产是由非洲男性主导, 时常也是殖民地政府积极鼓励的。粮食作物生产则几乎完全是非洲妇女的责任。这些对于非洲妇女经济机会的限制, 与殖民地 “土著法” 条件下对

① Kenneth R. Curtis “Cooperation and Cooptation: The Struggle for Market Control in the Bukoba District of Colonial Tanganyik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5, No. 3 (1992), p. 507.

② Nicholas E. Makana “Metropolitan Concern, Colonial State Policy and the Embargo on Cultivation of Coffee by Africans in Colonial Kenya: The Example of Bungoma District, 1930 – 1960,” *History in Africa*, Vol. 36 (2009), pp. 323.

③ Robert Shent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James Curry, 1986; Michael Watts, *Silent Violence: Food, Famine and Peasantry in Northern Niger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Moses Ochonu, *Colonial Meltdown: Northern Nigeria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9.

于非洲妇女地位所做的限制是相符的。到“一战”时，战时需求、资源有限性，再加上殖民地政府试图限制非洲人的流动性，以及殖民政府无法将粮食运送到发生饥荒的地区，这些因素导致粮食匮乏和饥荒的大规模爆发。^①

三 非洲社会在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方面的能动性

成功的经济作物生产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和地理因素、外部世界的需求、政府鼓励、税收货币化以及铁路和公路修建等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农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②由于非洲人对于市场机会的回应以及殖民政府所面临的资源限制，因此非洲社会的主动性成为非洲殖民地经济变革的主要推动力。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非洲小农经济主导着热带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作物生产，主要包括西非棕榈油、可可、棉花，东非的棉花、咖啡、糖、剑麻和茶叶。以下分别选取尼日利亚西部、黄金海岸以及东非的乌干达等典型案例，以揭示非洲社会在经济作物生产方面的能动性。

殖民时代西非经济增长主要是由非洲移民劳工、可可农民、花生收购者和公路运输者所推动的。非洲农民以各种方式回应殖民时代全新的需求和机会，从而极大地改变了非洲农村地区的基本面貌。西非的非洲小农经济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英国内部政策辩论越来越有利于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发展成为“非洲小农”殖民地。尽管殖民政府试图对于非洲人的经济作物种植加以引导和限制，但是非洲社会并非被动接受者。例如，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英国殖民者试图推动棉花大规模种植。这里的棉花种植已经有数百年历史，而且气候和土壤条件也适合棉花种植，因此英国人坚信大规模商业种植棉花能够获得成功。1912 年，通向卡诺的铁路通车，主要是为了推动卡诺周边地区的棉花生产。英国棉花种植者协会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棉花加工厂，并分发种子和肥料。然而，棉花并未随之大规模出现。农民更愿意种植花生，因为花生价格

① Gregory Maddox, “Njaa: Food Shortages and Famines in Tanzania between the Wa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9, No. 1 (1986), pp. 17–34.

② Robert M. Maxon, *Going Their Separate Way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in Kenya, 1930–1950*,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9–23.

要高于棉花,而且即便是歉收或者遇到其他灾祸也可以食用。1912年,尼日利亚北部发生严重饥荒,饿死约3万人。在此之后,种植花生的农民越来越多,而种植棉花的越来越少。英国殖民者未曾预料到,原本为了运输棉花而修建的铁路,却为花生运输提供了便利。英国人为刺激一种商品作物生产而修建的铁路,却导致另一种农作物的发展。^①正如非洲史学家约翰·托什所指出的,殖民时代“经济作物种植的成功,依赖于经济作物与已有的粮食作物生产之间的关系”,经济作物生产对于粮食作物生产的影响是“复杂的,时常是阻碍的”。^②种植剩余的粮食作物要比经济作物更具吸引力,更能满足非洲民众的生计所需。

在黄金海岸等西非大西洋沿海地区,前殖民时代到殖民时代有着很大的历史延续性。殖民地国家在推动社会经济变革方面作用极为有限。非洲经济作物种植的实际效果与殖民者的意图在很多时候并不重合,甚至大相径庭。最重要的经济作物生产大多是在殖民地政府不经意情况下出现的,例如黄金海岸的可可经济。19世纪80年代,黄金海岸开始种植可可,并且在不到一代人时间里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可生产国。黄金海岸的可可出口始于1891年,不到20年时间产量达到4万吨,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可产地。到1923年,黄金海岸的可可产出为20万吨,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超过30万吨。^③

黄金海岸的可可经济兴起,并不是由于殖民政府的财政压力所致,因为黄金海岸的税赋水平并不比周边殖民地高出太多。另外,尽管欧洲贸易公司在可可经济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非洲社会的能动性更为重要。19世纪、20世纪之交,欧洲殖民官员并未料到非洲人会种植这样一种需要多年时间才能有回报的经济作物。采用外来资本和最新农业技术的现代种植园被认为是开发热带地区“未经使用的”土地、面向世界市场生产的最有效工具。^④然而,事实证明大规模生产的效率极低。

①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 雷诺兹《非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2007,第297页。

② John Tosh, “The Cash-Crop Revolution in Tropical Africa: An Agricultural Reappraisal,” *African Affairs*, Vol. 79, No. 314 (1980), p. 80.

③ Gareth Austin, “Mode of Production or Mode of Cultivation: Explaining the Failure of European Cocoa Planters in Competition with African Farmers in Colonial Ghana,” in Clarence-Smith, ed., *Cocoa Pioneer Fronts since 1800: The Role of Smallholders, Planters and Merchan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p. 154.

④ Corey Ross, “The Plantation Paradigm: Colonial Agronomy, African Farmers and the Global Cocoa Boom, 1870s–1940s,”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9 (2014), p. 50.

这一时期黄金海岸的可可产量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小农生产,采用土地密集型的混合耕作技术。当地阿夸佩姆人早在 19 世纪已经向欧洲商人出售野生橡胶和棕榈油。到 19 世纪末,这些产品的价格日渐下降,阿夸佩姆人开始寻找新的适合种植的经济作物。可可种植需要清理出大片土地,清除灌木丛需要大批劳动力,而可可树需要 15 年时间才能成熟。因此,可可种植代表着对于未来的投资。阿夸佩姆人种植可可还面临的挑战是,这一地区的人口极为稠密;因此,很多种植者向西迁徙到人口密度较低的阿基穆 (Akim) 地区,向当地的阿基穆人购买土地。阿夸佩姆人最初利用家庭劳动力,后来也雇用劳动力来清除土地,并雇用搬运工将可可运至沿海地区。阿夸佩姆人中间逐渐出现农民资本阶层。^① 非洲农民主动接受了可可生产所带来的机遇,而殖民地政府只是事后予以认可。黄金海岸殖民政府决定支持土著农民,这是可可繁荣的结果,而非可可繁荣的原因。尽管铁路建造使得很多地区的经济作物生产成为可能,但是黄金海岸的库马西-阿克拉铁路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才发挥影响,到这时非洲生产者已经推动可可生产的急剧扩张。铁路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将可可运至沿海港口。

在东非和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经济作物生产在 19 世纪以前一直较为落后。19 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极大地推动了东非内陆地区的经济作物生产。殖民地政府强制非洲农民生产某些农产品。在肯尼亚和罗得西亚等白人移民殖民地,尽管殖民地政府试图迫使非洲人转变为雇佣劳动力,但是非洲小农经济非常有活力,他们抓住了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生产所提供的机遇。^② 例如,德属东非农民的棉花强制种植是“马及马及起义”的重要诱因。尽管英国殖民者所采取的强制手段通常并没有那么严苛,但是东部和南部非洲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的启动离不开强制,譬如棉花。棉花在英国进口原料中占有特殊地位,英国棉纺

① Richard Reid, *A History of Modern Africa*,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2, p. 198.

② A. I. Nwabughuogu “From Wealthy Entrepreneurs to Petty Traders: The Decline of African Middlemen in Eastern Nigeria, 1900-1950,”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23, No. 3 (1982), pp. 365-379; Gareth Austin, and C. Ugochukwu Uche, “Collusion and Competition in Colonial Economies: Banking in British West Africa, 1916-1960,”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81 (2007), pp. 1-26; A. G. Hopkins “Economic Aspect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in Nigeria and the Gold Coast, 1918-1939,”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7, No. 1 (1966), pp. 133-152.

织业将热带非洲视作潜在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从 1902 年开始,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在非洲殖民地积极传播“棉花福音”。^①例如,“一战”前夕,乌干达南部棉花生产迅速扩张,成为非洲殖民地经济作物种植的成功案例。在乌干达殖民地政府鼓励下,干达酋长阶层接纳棉花种植。不过,乌干达棉花种植发展反映出布干达人自身的社会和文化观念。干达社会是高度竞争性的,而棉花计划提供了个人发展机遇。在乌干达的兰吉地区,在前殖民时代已经生产出剩余农作物,主要是芝麻用于同布尼奥罗进行贸易。棉花是在 1909 年引入这一地区,它的推广是以牺牲芝麻生产为前提的,因此直至 20 世纪初兰吉农民才开始接受棉花种植,因为芝麻市场到这时已经衰退,棉花收购价格上涨。^②20 世纪 20 年代,欧洲种植园主大量进入乌干达,主要从事咖啡和橡胶种植。^③乌干达的非洲农民农业与欧洲人种植园农业得以共存。棉花作为主要经济作物,1920 年占到乌干达对外贸易的 90%,而咖啡作为第二大出口作物只占 2%。乌干达殖民政府意识到非洲农民棉花生产的重要性,但并未排斥资本主义生产。乌干达殖民政府不愿意欧洲移民在非洲棉花生产较成熟地区开办种植园。在布干达和东部省等主要的棉花产区,殖民地政府不愿意为了咖啡和橡胶而阻止非洲农民的棉花生产,这两种作物产量相对较低。^④非洲农民生产的棉花从 1905—1906 年的 1089 英镑增至 1910—1911 年的 165412 英镑。到 1920 年前后,乌干达已经排除了大规模发展种植园经济的可能性,而是沿着非洲小农经济道路发展。^⑤对于乌干达殖民地政府来说,税收的增加极大降低了乌干达对于帝国拨款的依赖程度,而这有助于乌干达殖民地政府实现财政自给自足。

① Grace Carswell, “Food Crops as Cash Crops: The Case of Colonial Kigezi, Ugand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3, No. 4 (2003), pp. 521–551.

② John Tosh, “Lango Agriculture during the Early Colonial Period: Land and Labour in a Cash-Crop Economy,”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19, No. 3 (1978), pp. 415–439.

③ E. A. Brett, *Colon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East Africa: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1919–1939*, New York: NOK Publishers, 1973.

④ Christopher P. Youé, “Peasants, Plants and Cotton Capitalists: The ‘Dual Economy’ in Colonial Uganda,”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12, No. 2 (1978), p. 165.

⑤ C. Ehrlich, “The Uganda Economy, 1903–1945,” in V. Harlow, and E. M. Chilver, eds., *History of East Africa*, Vol. 2, Oxford, 1965, pp. 409–413, 423–429; R. van Zwanenberg, and A. King, *An Economic History of Kenya and Uganda, 1800–1970*, London: Macmillan, 1975, p. 64.

四 小结

非洲殖民地政府积极推动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既是为了满足帝国本土的需要，同时也是由于受到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原则的限制。然而，尽管殖民地政府试图推行某种类型经济作物的种植，但是这一意图能否成功实施，则要取决于很多因素，尤其是非洲当地农民的能动性。在非洲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西非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的兴起主要是非洲农民主动性的结果，例如加纳的可可经济。在东非和南部非洲殖民地，尽管经济作物生产的出现离不开殖民政府干预，但是这一经济作物生产能否取得成功，同样也与当地非洲农民能动性密切相关。这也充分表明，尽管殖民统治在非洲十分残暴，但是它们的力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推行其意图。殖民统治的残暴性与其力量的有限性并行不悖，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因为其力量的有限，因而愈加强暴专横。^①

(责任编辑: 周军)

^①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 雷诺兹 《非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2007，第297-298页。

ditional loc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ra-ethnic conflicts in Tarime district located in north eastern Tanzania with the aim of creating understanding on how practices and decisions taken by informal loc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ffect the management of intra-ethnic conflicts. Systems Thinking Theory (STT) was used to guide analysis of governance issues in the existing intra-ethnic conflicts among Kuria. Ethnographic research design guid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was deploy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The data collected were subjected to content analysis to form themes and sub-themes of the study. The study findings revealed that Kuria's informal loc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have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influences towards intra-ethnic conflict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had potentials to trigger conflicts and they can als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ra-ethnic conflicts. The study further indicated that Kuria communities [clans] in the Tarime district, share common inform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which form part of their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thus they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apply informal approaches to manage conflicts in the area despite their limitations. However, despite such strengths of informal loc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ra-ethnic conflicts, their potentials were not fully harnessed in the Tarime peacemaking process. The study recommend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itiatives targeting recognition and the inclusion of informal loc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ra-ethnic conflicts among Kuria of Tarime.

Keywords: Conflict Management; Intra-ethnic Conflict; Inform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the Rising of Cash Crop Production in Colonial Africa

Li Pengtao, Wang Meng / 55

Abstract: European colonizers sought to facilitate cash crop production in African colonies. However, the rising of cash crop production in the African colonies were not the result of colonial policies, but depended on whether this cash crop production was suitable to local interest or not. In African peasants—

dominated west African colonies, cash crop production was the outcome of African agency, ie. the cocoa economy in Gold Coast. In East and Southern African colonies, which have white settler communities, even though colonial intervention had impacts on cash crop production, the agencies of African peasants also ha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outcome of cash crop production.

Keywords: Colonial Rul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ash Crop Production; Single-Product Economy; Dependency Theory

The Impa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on Intra-Regional Exports and Welfare of African Countries—Effect Simulation Based on Borders' Elimination

Wang Xia / 68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rder effe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counterfactual model based on structural gravity model and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 of trade policy, using the 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 (PPML) estimation method for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Africa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High degre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frica Intra-regional exports growth and African countries' welfare growth; (2) High degre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will substantially stimulate the intra-regional exports growth of larger African countries,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welfare of small African countries; (3) It brings benefit to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and most of gains accrue on the producer side. High degre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 regional trade and achieving the prosperity of all Africans.

Keywords: Structural Gravity Model; 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 Africa Regional Integration; Economic Effect; Borders' Elimination